

A CHACUN SA CHINE

每个人的中国

(1964~1965)

卡特琳·文慕贝/著 彭 怡/译

(Catherine van Moppès)



主席著作像太阳 字字句句指方向
全国人民齐学习 人人心坎亮堂堂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A CHACUN SA CHINE

每个人的中国

(1964~1965)

卡特琳·文慕贝/著 彭 怡/译
(Catherine van Moppès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个人的中国: 1964 ~ 1965 / (法) 文慕贝 著; 彭怡译.
—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3. 3
ISBN 978 - 7 - 5097 - 4182 - 5

I. ①每… II. ①文… ②彭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法国 -
现代 IV. ①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6062 号

每个人的中国 (1964 ~ 1965)

著 者 / [法] 卡特琳·文慕贝
译 者 / 彭 怡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(010) 59367004 责任编辑 / 董风云 段其刚
电子信箱 / bianyibu@ssap.cn 责任校对 / 郭艳萍
项目统筹 / 祝得彬 责任印制 / 岳 阳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印 装 /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版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4182 - 5
著作权合同 / 图字 01 - 2012 - 0348 号
登 记 号
定 价 / 39.00 元

印 张 / 14
字 数 / 236 千字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by
© Catherine van Moppè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ditions Albin Michel in 1965

本书由法国 Albin Michel 出版社 1965 年版原文译出，版权归作者卡特
琳·文慕贝所有。

中国，中国，中国，
我不是中国人，
我生在巴黎拉丁区，
我在塔巴兰舞厅
夜夜跳着蛇舞。

——《歌》，1900。

献给 M.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苏联的洗礼 1

经过莫斯科 / 1

“莫斯科人” / 9

欧亚列车 / 20

等待中国签证的法国女人 / 28

第二章 新中国的蓝天 34

欧洲人在北京 / 34

在北京过国庆 / 41

艳遇会否来临? / 44

讲故事的老爷爷 / 47

逛马路，看橱窗 / 53

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/ 62

遇到两个好男人 / 65

吃在北京 / 70

去一个女孩家 / 75

北京饭店的招待会 / 80

爱情与婚姻 / 84

没有铁栅栏的监狱 / 91

国际俱乐部 / 98

祖国的花朵 / 101

女厂长与大学生 / 109

在北京看戏 / 113

贫农最光荣 / 122

北京的冬天 / 129

第三章 南下，南下 141

和平饭店 / 141

迷失大上海 / 148

马格丽特小姐 / 153

这也算艳遇? / 157

工人作家胡万春 / 160

导演黄佐临 / 165

上海万花筒 / 169

南方，温柔的脸 / 175

尼龙袜·华侨 / 177

第四章 地狱：最优惠的价格 181

香港富婆 / 181

百姓与难民 / 191

澳门的悲喜剧 / 197

巴黎 / 199

第一章

苏联的洗礼

经过莫斯科

我在欧亚铁路（从莫斯科到北京）的火车上已经浪漫地坐了两天，独自面对着玻璃茶杯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条铁路真像是死了一般。它也许只存在于某些诗人的想象中……

哎，要勇敢……到北京还有 6 天，要好好想个主题。我越想越担心，最后甚至要做起噩梦来，把我烦死了。

那么，穿过西伯利亚这死寂的平原时应该想些什么呢？首先，应该想一些……应该找些事干……应该喝点东西……应该浏览一下关于西伯利亚人口增加的小册子？

俄国人呢，他们也只存在于小说中？那些小说，人们现在已经不看了，但在世界各国，人们都知道那些书名……

想说说谁呢？俄国人？苏联人？修正主义者？如果您是俄国人，您肯定不愿意被叫做“苏联人”。而如果您是“苏联人”：捷克人、波兰人、保加利亚人，您也不愿意被叫做“苏联人”。“苏联人”这个词已经不时髦了？

国王死了。国王万岁！人们不再说“苏联人”，而是说“修正主义者”，这个词要美丽得多，也更有知识含量。时髦，但很严肃。它不说“革命”，也不会让人想起武器，而是讨论，再谈论，心理分析，钻牛角尖，和阿拉伯、古巴、非洲的专家们，即所有的“革命专家”召开国际讨论会。我们的中国朋友让这个神奇的词活了起来，为了这个词，他们重新编写了一些辞

典，创造了一种新文学，重新塑造了一系列英雄，改造了一些不良意识。幸运的是，这些伟大的运动都能让人“青春永在”，能防止衰老。60岁的时候重新接受教育，如果不再让您拥有20岁时的腿，至少也得让您产生20岁时的思想吧？

经过莫斯科时，我遇到了苏联人……不过，还是让我把我的历险故事从头道来吧！

在从巴黎到莫斯科的火车上，快到波兰边境时，睡在下铺的一个穿米色衣服的可敬的比利时“女士”突然站起来，提醒我：“小姐，小心您的鞋跟。要知道，我上次坐火车经过波兰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想洗漱一下，穿上鞋子，却发现自己成了瘸子了……我弯下腰，检查‘罪魁祸首’，发现鞋跟在半夜里被人锯掉了。”看到我一副惊讶的样子，一个波兰女大学生笑着向我解释说：“这种事经常发生，因为许多女士都把珠宝藏在鞋跟里。她甚至还有点咄咄逼人地说：‘您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希望吗？我们也在寻找希望，寻找财富……’”

四天中，火车上的生活多种多样：有的人关在包厢里不出来，而24号车厢呢，是些社交活跃分子，喜欢晚上走来走去的人。还有些非洲大学生，他们拿的是苏联的奖学金，俄语讲得很溜，已经在基辅、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大学里学了三四年，他们在圣特罗佩、巴黎、伦敦和开罗度了几个月的假后，正在“回家”，回苏联。他们的度假费用是国家和家里给的。

他们很出色，有教养，非常优雅，是新派绅士。他们的快乐不是个人愉悦，而是集体欢乐。这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方式。由于他们擅长唱歌，节奏感强，他们不会很快就感到烦闷，而是能烦别人，弄得别人筋疲力尽，让别人感谢他们。

“我们殖民了苏联。”他们可爱地笑着，然后又对几个彬彬有礼地听他们说话的俄国人说：“但你们不会在西伯利亚看见我们。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无所不能。”

然后，他们非常严肃地开始解释为什么苏联正失去它在非洲的版图。

“苏联专家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活像个殖民者。他们感到不舒服，他们需要空调，需要汽车。他们把商店里的东西都买空了，让几十个人给他们量体裁衣……他们把我们带懒了。市场里连只猫都见不到。卖东西的都直接到苏

联人家里去卖了，价格可以高一倍。而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，有时卖几天都卖不掉。

“他们拿的钱比在苏联拿的工资高三倍，他们是‘专家同志们’，他们只发号施令，却从来不动手。他们没有给我们送礼，远非如此，而是以3%的利率借给我们。作为回报，他们觉得有权插手我们的政治。”

“而中国的同志呢，他们很真诚。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，而且往往干得比我们卖力。哪里最困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。他们拿的工资和非洲人一样……他们借我们钱从来不收利息……”

“嗯，苏联的同志们，你们怎么说？”

话说得滔滔不绝，俄语又是那么无可指责，弄得苏联的同志们无言以对，他们只好点头。有的说：“我不是苏联人，我是南斯拉夫人……”还有的说：“我是波兰人”，“我是俄国人”……

剩下的那些人则说：“与其在人造卫星或非洲人身上花几十亿，不如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……”

黑人大学生拿出苏格兰威士忌和烤鸡腿，用他们习惯的慷慨，大方地分给众人吃。尽管斯拉夫的内在精神状态非常复杂，但俄罗斯人还是忍不住要喝酒……最后以唱歌结束……各管各的调……

我回想起来，今年夏天，我有一次在塞纳河边散步，看见一个达喀尔大学生在表演，是个业余作者。他首先客串“黑非洲”人，表现出一种南美的优雅。第二场，他竖起衣领，粘着胡须，戴着墨镜，弯着腰，脚步颤颤巍巍……那是个知识分子，钢琴家，与一个瑞典女人结了婚（瑞典女人已经不流行了，英国女人还“马马虎虎”，至于法国女人嘛，太容易得手了，太容易征服），是“美国黑人”的代表，10年来，他在古老的欧洲流浪。第三场，他换上了一件无尾长礼服，撕成一条条，人工痕迹非常重，头戴高筒帽，白色的手套一尘不染。他跳着查尔斯敦舞（1920~1925年流行欧洲的美国舞蹈。——译者注），嘴里叫道：“我是法国人，我在跳流行舞！”

我们和朋友们都感到很惊讶，朋友们不喜欢这个节目，因为有的东西是不能“开玩笑”的，哪怕是在巴黎，在塞纳河边，哪怕你只有20岁。

这不是种族主义，至少不是公然的种族主义。恰恰相反。这是一种新的时髦病。由于没有生在有色人种家庭而产生的自卑情结。人们原先还估计他们没有，不想有。

我们和那个达喀尔大学生去“老海军”喝咖啡：他充满了幽默和智慧，正在准备一篇关于混血儿的论文。他放得很开，我们也同样。

到了莫斯科车站会有什么感觉？已经感到被盯梢了，感到自己犯了罪？尽管没有门，却感觉到有只眼睛贴在锁孔上？

兰都旅行团（官方的旅游机构）在站台上等外国人。站台上非常乱，国际青年论坛将在莫斯科召开。人们在接代表团。

“太没意思了，”我对那些非洲朋友们说，“兰都负责中转的部门将负责接待我，把我安排在一个很贵的大旅馆里，因为我只在莫斯科住一晚，明天要搭欧亚列车。”

我的骑士们都训练有素，他们负责我的一切……带我参观“他们的”莫斯科。他们替我拿小手袋。我一瘸一瘸地跟着他们，他们大老远就向盯着我们的警察亮出一个证件。我们被放行了，他们推开看热闹的人群让我们通过。“他们接待我们。”我们荣幸地从客人和代表团的贵宾专用通道上通过。一个很有“乡村”色彩的女孩向我献了一束花，表示欢迎。在这期间，我的朋友们在办各种手续。“一切都符合规定，让我们走吧！”他们回来找我，说。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怎么样，又是为什么我突然符合规定了，我只在莫斯科中转一个晚上，我拿的是中国签证……我想起“在符合规定前”，我在巴黎等了几个星期，办理证件非常复杂，一系列误会，数不清的手续，问不完的问题。

在巴黎，生活是多么艰难！

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开得大大的，他们去给我们找出租车，给我们拿行李。我们紧紧握手，有几个好奇的人鼓起掌来。我摇晃着欢迎我的小花束。我们上了出租车，车开了……

我们自由了！我现在“隐姓埋名”地来到了莫斯科。待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误了火车，结果要在苏联的首都自由地溜达一个星期。

“先放下东西，到我们的大学里找个寝室住。”我的一个新朋友建议道。

许多用砖建造的房子，里面可能是车间、诊所或者是临时用作冷库的地方。有个大花园，尘土飞扬，让人看着都累。

楼长是一个学农业的大学生，已婚，24岁，他非常激动地接待我。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出示了我的学生证，但谁也不懂法语，所以他们马上就把证

件还给了我。大厅、走廊和楼梯都是灰色的，没有光泽，但很干净。有个列宁塑像，还有几个橱窗，夹着当天的报纸。阴暗的走廊里，几个穿着柔软的民族服装的老妇人，坐在一张腿有长有短的桌子四周。这是接待室，日夜开门。各个年龄和各民族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，衣服皱巴巴的，看书看得眼睛发花。每个寝室里都有三四张铁床、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。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厨房和一个公共卫生间，之间仅用一块板隔开。在一楼的食堂里，可以买到煮鸡蛋、香肠和可可奶。

楼长随意把我安排在跟我的非洲朋友同样的房间里，朋友们马上就把啤酒和威士忌都拿了出来。大家席地而坐，或坐在床上。我坐在桌子上。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。酒瓶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。门开了，是女学监，她三四十岁的样子，也像是四五十岁，一块方巾“俄罗斯式”地围在头上。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，跟那些男孩子打招呼。假期愉快吗？她看到了我，马上严肃地对我说：“dievouchka（俄语，意为“女士”。——译者注），这样坐在桌子上可不好，站起来”。由于我没有站起来，她推了我一下，想让我从桌子上下来。

现在，我们要去参观莫斯科了……首先宣布纪律，到处都这么烦，每个人都这么烦。不仅仅是衣着问题、发型问题和黯淡的目光问题。不，这是一个没有个性、没有阶级的民族。一块人道的面团，一个点，仅此而已。会呼吸的面团，很喜欢喝酒的面团，吃得很多的面团。然而，在仔细分析他们，找出他们个性的时候（这可不那么容易），我能看见口红、眼线笔、高跟鞋、有时也挺成功的发型、没有翻口的窄窄的长裤、翻领运动衫、颜色鲜艳价值200法郎的塑料雨衣，我发现各种颜色、各种习俗和审美错误奇怪地混在一起，但那种错误毕竟还没有到达丑的地步。

街上非常热闹：马路两边有许多货亭、摊档和摊位，上面有水果、青菜、报纸、纸烟、彩票、糖果和书籍。报摊上有斯丹达尔、梅里美、莫泊桑、巴尔扎克和俄罗斯经典大作家的作品，也有新日历、童书和共产党的宣传读物。人们在排队，在咨询，在翻阅。阅读没有年龄之分，莫斯科也没有年龄。

马路边的“小咖啡”店，如同战场上司令部的帐篷，那是拿破仑一世时期很常见的，真正的营地，马戏团的帐篷。可以站在里面或坐在高高的圆凳上喝奶或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加奶，也可以尝尝油条，但往往都有点太冷、

太油。

也有一些大众化的饭店，自助式的，可以在里面站着吃，有时也坐着吃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都吃得很快，喝汤，吃煎鸡蛋和小馅饼。

幸亏有地铁，著名的莫斯科地铁，产生美梦和噩梦的地方。这是仙境中的爱丽丝，是拜占庭，是阿兰·雷斯内（1922～ ）【法国著名导演，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，他导演的意识流电影《广岛之恋》和《去年在马里安巴》（著名作家罗布-格里耶创作）影响很大。——译者注】，还没有发现马里安巴的豪华宫殿，是1880年的妓院，是凡尔赛的镜廊。每座机械楼梯都是一个浮岛，看不到头，也看不到尾。巴洛克风格的圆拱是用大理石和镜子做成的，那就是天空。当地人像囚徒和避难者一样，被判待在这个荒无人烟、一眼望不到边的走廊里，他们感到了恐慌，奔跑起来，撞在了镜子上，在虚伪地雕刻着图案的大理石地面跌跌撞撞地滑行着……

地铁站里几乎到处都是货摊和货亭，给地下的民众提供面包、火腿、奶酪、番茄汁和苹果汁。

天是阴的，很冷。莫斯科在下雨。生命躲在1900年的大旅馆里。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拥挤的巴洛克建筑，还有比这味道更重的地方。这是图卢兹-洛特莱克时期化妆成歌妓的一个巨人的宫殿，一座城市。人们等待着食人魔、牛奶面包、奇怪的战争、大草原、假门、假情况、叛徒的假胡子。里面有一座银行、一个理发厅、一家小医院、一间杂货店、一所邮电局和通常都有的卖纪念品的商店。

十来个家庭妇女、小男孩、佣人、职员、学监、翻译，穿着熨得平平整整、浆洗得笔挺的蓝色或白色的制服（好像他们忠于圣母玛丽亚似的），似乎在扮演芭蕾舞中的人物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种现代音乐（斯拉夫爵士和两年前的法国歌曲，古巴革命的节奏和印度、日本的传统歌曲）响彻兼作饭店的咖啡厅里，里面已经找不到一个空位了。

莫斯科人来“看”“外国人”，并且迎接他们。这些外国人又去迎接别的外国人。大家都相遇在伏特加、啤酒和红酒跟前。外国人借口说俄国菜分量太重，要么几乎不吃，要么只吃鱼子酱。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，莫斯科面对吃与喝，宁愿选择“哥萨克式”的喝法，并做出吃的样子。

现在，在莫斯科，在都会酒店的咖啡厅里吃中饭或晚饭，晚上到莫斯科

酒店去跳舞已成了一种时髦。朋友们就是请我在莫斯科酒店吃饭，与别的非洲学生度过了一个“舞蹈之夜”。

这是一个很现代的大厅，能俯瞰整个莫斯科。里面有些小桌子，有时用一些竹子做的屏风隔开，营造出一种如果说不是亲密，起码也很舒服的气氛。有各个年龄段的夫妻，也有一些年轻妇女和跟父母在一起的小女孩。

啤酒、香槟、干邑、伏特加，什么酒都喝。如果说吃得不好，起码吃得很多。菜和普通餐厅里一样，但要贵两三倍。“我们今晚出去。”乐队不错，他们也把各种乐曲混杂在一起：伦巴—探戈—恰恰—华尔兹—扭腰舞。舞池里开始一个人都没有，后来，借着酒劲，男男女女入场了，越来越多。到了11点钟的时候，人们开始互相踩脚了，推来搡去。

我的非洲朋友开始互相争抢，他们邀请年轻的独身女子跳舞，他们轻轻地搂着她们的胳膊，非常严肃地谈论着什么。他们要求乐队演奏扭腰舞，乐队便演奏起了扭腰舞。几个德国大学生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当中，我们跳着扭腰舞，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苏联人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，其中有几个甚至想模仿我们。那几个德国大学生跳完两三曲传统舞之后，要求乐队再演奏扭腰舞曲，遭到了拒绝。乐队彬彬有礼，但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每晚演奏一曲扭腰舞，这已经足够了。

这些音乐全都混在一起，我的非洲朋友们难以忍受。他们喝得有点醉了，站起来，去跟乐队交涉。所以，那天晚上，第二次演奏了扭腰舞曲……

10点左右，一队年轻女孩风风火火地进来。她们梳着“弗朗索瓦斯·哈代”或“布里吉特·巴铎”的发型，裙子又短又窄，鞋跟倒很高，羊毛套衫非常紧。她们涂着指甲油，描了眼圈，抹了口红，甚至连腮帮子也抹得红红的。她们在大厅里转了很多圈，然后在我们桌子边上停了下来，低声地互相说着话，不时爆发出巨大的笑声。一个非洲学生走到她们身边，他们谈了三分钟。到了第四分钟，她们便围住了我们的桌子，她们并不怕烧酒。

她们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服务员，有的是大学生，全都不到20岁。她们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来跳舞。她们想来学新的舞蹈。她们喜欢看电影、塑料和尼龙袜。她们其中的一个女孩还补充说：“多亏了共产党，我们才有了这一切……”11点钟时，她们走了，但给大学生们留下了地址。

“在苏联，”他们对我说，“是女孩寻找男孩，采取主动。她们最喜欢让我们多花卢布，她们会要两份一样的菜，尽管不想吃。她们喁喁私语，说些关于非洲人民和苏联人民友谊的大道理。她们把非洲某某城市的有关数据熟记于心，背给我们听。她们要找丈夫，条件是她们很快就要回非洲。”

半夜了，我们是最后离开舞会的。在莫斯科酒店门口，有个醉鬼嘴里嘀咕着不知什么话向我扑来。酒店的侍应马上就把他赶走了。半夜里，可以听到到处都有笑声。

我的非洲朋友跌跌撞撞地走着，继续用他们的方言争吵着，偶尔间杂着几句俄罗斯粗话。

突然，我们被十几个男人围住了，这些人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“皮条客”。——原来是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。——星期六的晚上。——有几个非洲人装腔作势，醉得厉害。——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冷得发抖，昏昏欲睡。——简直是布莱希特话剧中的场景。谁也没有动。谁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出什么事了？

我们终于上了一辆出租车。车后座的地上丢着一些破报纸，被我们踩皱了。大学很远，在郊区。我们穿过了一个公园。雪亮的车灯照亮了几个女人的影子，她们很快就逃到了灌木丛中。出租车司机略扭过头，他知道用不着解释。他慢慢地说：“dievouchka……给我5个卢布，给她10卢布。这不行，怎么说也不行。”他很镇静，甚至有点盛气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知道他的小费不会少，因为非洲人很慷慨，而且，今天不给，可以明天再要……

我的非洲朋友向我解释说，莫斯科并没有妓女……不过，诚实的女劳动者和良家妇女加几个小时这样的班，赚点零花钱。当然，这种事不是在家里做，也不是在酒店做，更不是在邻居家里做。大的娱乐场所是禁止做这种事的，你已经猜到了，不是吗……是在地铁里。必须承认，地铁好像确实是为了这种事而建造的。还有些公园和别的战略之地。

这不是拉客，而是约会。要得到一个约会，就必须知道“地址”。而这种地址，要到出租车司机那里去买，就像买彩票一样。

最后，一切都很传统，很封建。出租车司机无非是代替了家中的父亲。两个主角第一次约会时只有到了生米煮成熟饭时才见面，这在现在是非法的，而在以前是合法的……

只是，对于过去来说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而现在是一个小时的事情。

但在一个现代男人的一生中，一个小时值多少钱呢？这要去问出租车司机。

为什么不写一本《全球出租车司机的故事》或《出租车司机所见到的小故事》呢？

第二天，正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开得快一点——卡车大塞车——我才误了火车。

我必须把票取消，另外买一张，然后申请一周的过境签证，而且要说明原因。怎么向当局解释我为什么住在农业大学的校园里，而不是在巴黎就电话预订的过境旅客住的旅馆呢？

还是由于我的非洲朋友的影响，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，甚至没有问我在莫斯科的地址，不到五分钟，他们就给了我签证。

在旅行社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在基辅学医的非洲女孩，我们带她到莫斯科酒店去吃自助餐，那里有许多大学生、教授和官员。

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她，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。妇女和儿童用手指指着她。我佩服这个女孩的冷静，她好像熟视无睹。

当我独自一人在莫斯科散步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没有一个人打量我，我带法国口音的俄语让别人都把我当成了一个乌克兰女人。我的衣着非常得体，穿着一件系腰带的土黄色雨衣，就像是魔术师的大衣，既可以“假装”耶耶摇滚歌手，也可以假装“苏联人”。但当我和我的非洲朋友们出去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：马上就有人跟上来，仔细地检查我们。

“莫斯科人”

我是在都会酒店的咖啡厅里躲雨时，开始弄清在苏联的非洲人的事情的。

我一坐下来，要了一杯传统的茶，人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我的桌子跟前（全都是客人坐的桌子）。首先是两个工程师，三十来岁，其中一个问我要美国香烟，另一个要《恶之花》。他们乱七八糟地向我列举他们所知道和听说过的有关法国、欧洲和美国的一切。好像没有比打听国外的事更时髦了。凡是非苏联的东西都“激动人心”，他们邀请我星期天下午到他们家里去喝茶，他们共用一个小套间。

“我们的生活非常好，”其中一人说。另外一个人补充道：“是的，对苏

联人来说。”

“慢慢地，由于赫鲁晓夫同志，我们成了自由人，”其中一人说。另一个人接着说：“可惜的是，享受这种得来如此不易的新自由的，不是我们这代人。我们是‘烂掉的’的一代。老一辈有‘革命’，新一代将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下的自由。”

“我们开始过着国际化的生活，开始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。我们的大学邀请了许多外国学生。”其中一人说，另一个人接下去说：“看看我们的党为非洲做了些什么……怎么对待他们都不过分……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给他们奖学金，给他们度假的费用，住宿、暖气、学习全都是免费的。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‘对’的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‘对’的。他们‘坐出租车’消磨时间，整天泡在舞厅里。他们到处献殷勤，公开批评我们，觉得我们‘贫穷’、‘穿得破破烂烂’、‘落后’。他们老是在说在巴黎、伦敦或波恩的生活更好。他们老是纠缠女孩。我们党最好还是多改善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，而不要老想着与这些‘黑人’搞好关系，他们一心想着喝酒、找女孩和跳舞，很看不起社会主义。”

一个从古巴回来的苏联专家加入到我们的谈话当中：

“我到卡斯特罗的国家之前，在非洲待过两年。我什么都明白，让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最优秀的人留在自己的国家里，也就是那些‘穷人’，没有饭吃的人，赤手空拳奋斗的人。也就是社会主义者，明天的共产主义者。但‘他们’从来不把‘那些人’派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所接待的，都是一些‘特权人物’。”

“可你呢，同志，”我差点要问他，“你不是这些特权人物中的一员吗？你在非洲，在古巴，明天也许又会去印度……”

我没必要这样批评他。其中的一个工程师（问我要《恶之花》的那位）叹了一口气，轻声地说：“我也很想去非洲，去古巴。”

另一个工程师（要美国香烟的那位）毫不含糊。他想认识美国，想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。无论如何，美国人在科学方面懂得很多，苏联人要赶上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……

我独自一人。我的朋友们要稍晚一点才来接我。我又要了一杯茶。桌上放满了空杯子，我们一边讨论，一边喝了许多杯伏特加。外面，天很冷，下着雨，还刮风。很烦，里面，很多人又吃又喝的。有些人一副心满意足的